

清光绪11年2月19日天刚麻麻亮，六安县官亭保张家湾的一个书香世家灯火辉煌，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诞生了。这就是后来名震遐迩的启蒙思想家高一涵，取名永灏，是兄弟姊妹中的老么，上面有三兄二姐，母胡夫人已41岁，父显耀在西关亭开了间杂货铺。

永灏聪明伶俐，五六岁时，从长兄永善(清郡庠生)读书，13岁能诗善文，17岁从二兄永昭(清郡庠生)读，同年“考中了清光绪年间秀才”，乡邻们以“小才子”称永灏。

新生命的曙光

1906年永灏21岁，入“六安州中学堂”。六安州比张家湾繁华了许多，灯红酒绿，商贸云集，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新思想，结识了一批博学多闻的人。1908年因学业优异，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学生和老师的普遍赞誉，尤其受到学监和国文教师喻康侯的赏识，推荐他去省府安庆深造，于是，高一涵顺利进入安徽高等学堂学习。

从六安州中学堂到安徽高等学堂，所学新知识、新思想，开启了高一涵新生命的曙光。

——阅读进步报刊，明白了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在六安州中学堂读书时，高一涵开始接触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等报刊。到安徽高等学堂读书后，开始阅读《民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进步书刊，使青年学子们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不是“国民恶劣”；应建立共和，不应维持专制，革命志士们创办的进步报刊把他们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严复翻译的学术著作中，看到了祖国的未来。高一涵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时，学监严复的影响甚大，他翻译的反映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名著——《原富》《法意》《社会通论》《群己权界论》《天演论》等，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深远。他们对西方国家经济发达、政治开明，心生羡慕；特别是自1640年到1688年的英国革命，推翻了封建专政，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规定人生而平等，公民有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找到了革命的目标和国家的未来。

自费留学

1912年，高一涵在同乡刘希平的鼓励和支持下，自费赴日本留学；次年，入辅仁大学政治经济科学。因“二次革命”失败，友人亡命，资助中断，只能靠卖文为生。恰逢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聚集了陈独秀、李大钊、黄侃、周鲠生、张东荪、易白沙等人，高一涵跻身其中，并与《甲寅》同仁结下深厚的友谊。高一涵在《甲寅》上发表了《民国之称衡》《民福》《宗教问题》等文章后，得章士钊赏识，结为至交，长期共事。在日本，高一涵与陈独秀、李大钊结为挚友。

因在《甲寅》论坛上的突出表现，高一涵在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1915年2月11日，冒雨出席有2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参加的大会，抗议不平等的“21条”，成立留日学生总会，被选入留学生总会工作；1915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神州学会”，编辑《神州丛刊》，并成为该会主要成员；1916年2月，被留日学生总会推选为文事委员会委员长、总会评议员、经费委员。李大钊被推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机关刊物《民权》等。高一涵在《民报》上发表《国本》《共和》《程度与民政》等文章。

在日本四年，高一涵奠定了思想、学术和人脉根基，为启蒙思想家的奠基期。

与《新青年》的密切关系

从1918年入职北大到1926年南下参加革命，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工作了整整八年。这八年，高一涵有幸与胡适结为同事、密友，置身于“五四”运动大本营，成为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的得力助手和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得力助手，是为启蒙思想家的高光时刻。

高一涵还在日本留学时，就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连载论文《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这篇文章思想敏锐，见解独到，是其启蒙思想的锋芒初显：“吾共和精神之能焕然发扬与否，全视民权发扬程度为何如。澄清流

启蒙思想家高一涵的多彩人生

程东峰

水，必源于源。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我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又引用浮田博士之语：“人格因勤劳而成立，因勤劳而实现……。凡属有益于社会之勤劳，皆视为神圣，而尊之敬之，视为发育人类之品性、完全人类之人格所不可或缺者。”“青年自觉之道，首在炼志，次在练胆，又在练识。“炼志、练胆、练识，三者互相为用，缺一不可。”李大钊见到这篇文章，到处寻访高一涵，不久便与其结为“无话不谈的密友”。

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篇数仅次于陈独秀，从第六卷起，成为《新青年》六大编辑之一。蔡元培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胡适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

诗人情怀

1931年春，高一涵接受监察院长于右任邀请，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1940年，出任甘、宁、青监察使，期间的诗歌创作，成就了他多彩人生的另一面。“余生平喜读诗而不善作诗，故于诗学未窥门径。庚辰之秋，自湘来京，途经重庆，值长沙章行严先生于山洞，刘先生正埋首诗词间，日有新作，极力劝余为诗。到兰后，孑然一身，交游益寡，深宵孤灯独坐，郁郁寡欢，姑试为之。得诗二百首，从未取出以示人。壬午秋，行来兰州，索阅存稿，谓大体尚可，仍宜多读多作。厥后积渐成癖，无间闲居访友，兴到即作。五年间存诗六百首云。”他在《金城集》中这样自序的。

高一涵的诗多为因事吟咏、触景抒怀之作，真情流露，颇有诗味，诸如《云海行：庚辰冬由渝飞兰两渡云海因作此歌》为例，试析之。

“蜀江水暖蜀山深，千岩万壑时昏沉。渝州三冬成雾市，日月晦冥无晴阴。我今奋飞御天风，扶摇直上见晴空。鼋鼍银峰映朝日，璇光四射何玲珑。”

结尾处写道：“撑天拔地蛇龙走，下视五狱皆培塿。遥望黄河九折回，盘涡倒卷声如雷。崧崧耸立势崔嵬，嫫媧雄烈何雄哉。翩然一降落尘埃，天上人间任往来。”

无论是状物与写景，还是用典和气势，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抱负。1940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汪精卫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宣布成立汪伪政权，国民党内出现分裂，汪伪投降日寇趋势明显，故有“千岩万壑时昏沉”，“日月晦冥无晴阴”之叹。“天风”指人民的力量和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见晴空”和“映朝日”意味着抗战必胜，祖国的未来必然是晴空万里。“撑天拔地蛇龙走……”四句，借景抒怀，进一步表达了中华大沃野千灵、英雄辈出，定能克服困难，赶走日寇，获得全面胜利。最后一联，表达作者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清除国家蛀虫和民族败类，无所畏惧、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这种借景抒怀、托物言志的诗，《金城集》中俯拾皆是。高一涵在甘宁青期间，结识了一批好友，1942年“端午节”成立“千龄社”，被公推为副社长。“千龄社”不时聚会雅集，吟诗抒怀。他们以抓阄的方式拈“字”为韵，限时作诗。“千龄诗社”一共雅集四次，谨以第三次雅集为例，管窥一般。

“胜利日，千龄社金城燕集，分韵得河字：

“频年四塞角声多，此日金城醉凯歌。富士峰高看立马，大和魂断竞投戈。神山历劫仙犹死，卉服来朝海不波。徐市灵槎天际去，恍疑博望泛星河。”

“黄龙府内醉颜酡，醪醑惟平庆止戈。海峽参差归版籍，蓬莱清浅徙鼉鼉。三韩帝祚开新运，万国盟书赞协和。汲尽沧溟供洗甲，漫劳壮士挽天河。”

用典信手拈来，“魂断竞投戈”和“历劫仙犹死”写日本人惨败，犹如“万劫”不复之态，致神“死”；“金城醉凯歌”和“黄龙……庆止戈”写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的喜悦与豪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一涵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后任江苏省司法厅长、民盟江苏省副主委、全国政协常委。文革中，高一涵受到不公正待遇；1968年1月23日病逝家中，享年83岁。1978年12月28日，江苏省政协、民盟江苏省委在江苏省政协礼堂为高一涵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恢复名誉。



的行踪，还是被我外公及时捕捉到。自从当了组长，他就自动把“瞧水”的职能，搬到肩上。瞧水，是一项极为辛苦的工作，因为村庄与农田都处于起伏的扇面上，田无三尺平，坡有一丈高。雨水落地，不急需去路，通常先聚集池塘里喘口气，池塘一满，便溜进秧田，秧田一旦上演“水漫金山”的戏码，刚插的秧苗，就会连根漂起。此时，瞧水的人，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会承接大雨的才智，疏而导之，让整个扇面上的雨水，分途流入小河湾。外公就凭一把锹，理顺各条地表径流之间关系，上下衔接，东西聚散。看到秧苗在水田中安常处顺，看到流水在沟渠里按步就班，外公会情不自禁地用“倒七戏”的调子，唱起布袋和尚的“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其声呜呜然，一直传到河湾的对岸，外公坚信他的歌声，雨水与秧苗都能听懂，那位大腹便便和尚老儿，也能听到。

一连三天，我都跟着外公出去瞧水。载好斗笠，披上蓑衣，再将裤管高高卷起，也拎上一把铁锹，搜寻径流的路，安排雨水的去路，也在风雨的伴奏下，哼一段“南冲细雨密如麻”之类的家山小调。不一会工夫，上半身成了雨人，下半身成了泥人，那副德性，惹得梁家的四老爷捧腹大笑。

入梅那天，村学里的学童陆续回来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我也不得不跟麦场告别了。临行前一天，外公捧着新麦面做的烙饼，让我放到外婆家的坟前，既是祭拜，也是辞行。外公告诉我，外婆的小名就叫小香香，跟这年熟熟的麦子同名。他一共烙了六块饼，给了外婆二块，其余让我带上。可外公哪里知道，除了烙饼，我还带上外婆喜欢的歌谣：收麦先收小麦香，插秧先插早稻香。

那年芒种，一条螳螂生，二候鸚始鸣，我在汤庄协助外公割麦插秧，三候反舌无声，而我则回到外公割麦的教室里，先上《农麦假日》，再随老师诵读：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纪念王余九先生

徐 航

自今年三月初，我为了写一部较长的作品，在上海小女儿处小住。在网上得知王余九先生逝世，非常难过；又知他得了将近90岁，不禁得到些许安慰。这是余九先生心情平淡、与世无争、善待人生的结果。

王余九先生是具有文学大才的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以后很长一段岁月，舒城孙毓、金寨王京隆、霍邱王余九，是皖西三位扛鼎文学大旗的人。

当时作家不像如今众多，文学刊物也极少。因此，若某地出现一个会写文学作品的人，而且能在文学刊物上露脸，往往会引起万众注目。王余九就是如此。他自1963至1986年，相继在《安徽文学》上，发表了《捕象的人》、《二十四棵桃树》、《初探大别山》、《窗口》、《虾圆子》、《昨夜来客》、《祥茂会亲》、《林中》、《睡莲》、《孤独的守夜人》等10篇小说，还有报告文学《漫流河上的报告》等。这还了得！

这10篇小说中，最有名的要数《窗口》。马德俊同志在为王余九文集《窗口》所作的序中称说：“王余九的创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了‘井喷’。小说《窗口》从改革开放后安徽的一角看中国农民的命运。一个区委委书记，强令社员群众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受‘左’毒戕害，愚忠至极的农村基层干部，虽然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仍然不得不在黑夜裡把自家自留地上的红麻拔掉，以便做出榜样。小说让我们看到整整一代被折磨被委屈的中国农民的痛苦，在省党代会上，王余九写的《窗口》与鲁彦周写的《天云山传奇》一道，被视为改革开放后安徽文学界的重大收获。《光明日报》还发表了著名评论家刘锡诚的文章《向生活深处开掘》，将王余九老先生的《窗口》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视为有同等价值的作品。”德俊同志所言极是。

王余九在外享有盛誉，但在霍邱县却处境尴尬。1982年夏天，安徽省召开第一届淮河文学笔会，六安专区王余九、王京隆、李家馨(寿县人，笔名春井，诗人，后调淮南市工作)和我4名与会，在会上，大名鼎鼎的王余九(大家都喜爱地称呼他“老九”，却受到农村残酷的嘲笑，主要笑他不会“混”)王余九出身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帮工，他和姐妹们拾破烂，几乎沦为乞丐”；王余九1949年7月新中国建立前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大别山剿匪；1956年复员，考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回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而且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年龄也不大，不到40岁，就凭这5项，在任何地方都应是个“一官半师”，可王余九的最高“官衔”，却只是霍邱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余九面对这些嘲笑，只能陪着笑脸，我们与他同伴也顿感脸上无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境况呢？据我所知，这与王余九的性格有关。王余九忠厚正直，待人诚恳，处世清平，读书很多，能言善辩。文人每开会，不少人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说古论今；他幽默风趣，常把别人说得笑作一团，但他自己却一本正经，不开玩笑。但他不会阿谀奉承，不会圆转，更是防人无术，因而常被人算计。举个例子，他写作、发表《虾圆子》，就使他栽了个人生大跟头。这篇小说发表于《安徽文学》1979年第10期，反映“文革”后期官场某些官员的丑陋嘴脸以及小人物正直善良和委曲求全的命运。小

退休了，领导、同事、同志、学生、朋友们纷纷祝贺。有电话肯定、鼓励的，有发信息祝福、期望的，有送花、请客、拍照留念的……一时着实令我幸福、感动和感激！但最令我感怀的还是同室同事张老师，也就是本市登项珠峰第一人，赠送的一尊“退休纪念杯”。它异常精美，深蕴涵义，饱含深情！

端午前，张老师约了几位朋友陪我吃饭。饭前，他为我送上鲜花后，竟又从礼品盒中捧出一个亮晶晶、金灿灿的“荣休纪念杯”赠我，仪式感满满！我诚惶诚恐、受敬若惊，感动得有些不知所措，幸福又感激！

纪念杯是水晶玻璃材质的，很沉，感觉是一生工作旅程经历的浓缩似的。正面是山峰状造型，侧面成梯形，右面是如刀削一样光滑、笔陡的悬崖，左面及山顶被刨成陡峭崎岖的山道——虽然不大，但看上去很巍峨；虽然不高，但很稳重；虽然不高，但要想登顶却也不易；虽是一样厚实，但又如水晶一般明亮通透！这不就是人生么？我很乐意把他想象成就是一个美好人生的形象概括与无言诠释。

在这座“山”的左侧与底部是一组鑲金浮雕，金灿夺目，富贵吉祥。浮雕底部横躺着一块长长的山石，“蝙蝠”状，线条流畅柔美，明里闪金光，暗中含“福祉”。靠左边山石高处屹立一株茂盛的龙松，挺拔粗壮似有千岁。它老当益壮，枝叶繁茂，向右伸展，宛如瑞龙回首，瞭望山下风景一年年。那一簇簇松针全被做成一只只“蝙蝠”，松身披金金，满树是金“福”，俨然是尊贵、富丽、吉美的寿星。在松树之上、山石右端，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金鹿。它头戴杈状的花角，身披梅花外衣，杵着四条硕长的美腿，正回头凝望，给人送去“福禄”。石是“福”，鹿是“禄”，松是“寿”，石、鹿、松完美结合，巧妙地给人送来福、禄、寿。

杯中的上部是镌刻的文字。上部的“荣休纪念”四个行楷刻字点明主题，它们精妙地组成合“品”字形，使人自然想到“人品”“品质”“品味”。“光荣”的“荣”字金色，最大，被突出放在上面；“退休”的“休”字也是金色，但只是“荣”字一半大小，被往小里看，在右下——退休光荣，只是生活样式的转变和奉献空间的位移，没有什么大变了；“纪念”二字连在一起，与“休”字仿佛大小，上下排列，红

说写得尖锐深刻，令人警醒，为皖西文学创造了一份辉煌。

可是，小说发表后问题来了。我们还是按王余九自己在文集《窗口·前言》所言来说吧：

“1977年，我写了《虾圆子》，全垦上下，凡有看书人的地方，人人争看；街头巷尾、村墟各场人人谈论《虾圆子》。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提起我这个人或许人们已经忘记，但是提起《虾圆子》，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

“后来的发展，纯属非正常情况。一些当时的权豪非要对号入座，对我施行种种欠光明的手段，使我丧失了创作的热情。经年已久，往事如烟，过去了也就无所谓了”。

王余九在此说得云淡风轻，其实他当时压力山大。“一些当时的权豪”(又有权，又豪横)一口咬定《虾圆子》中所写的丑陋官员是写他们，对王余九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王余九能保住小命就算不错了，还能谈得上官场的升迁吗？更可怕的是，中国人历来反感“谤文”。《虾圆子》经权豪们这么一闹，堕入谤文行列，权豪们竟得到不少人的些许同情，反而是王余九里外不是人。小人物王余九，能经受得了这么天翻地覆的折腾吗？

我们知道，小说反映的是生活的横断面。它不象新闻通讯或报告文学，第一要的就是“真实”。小说则不然，凡小说皆属虚构。写一个人物，身在北京，脸在山西，综合而成。官场的权豪们哪懂这些呢？因此，远在1958年党就号召“学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应出版了“文学小丛书”，32开本，便于携带，我记得共出了数十种，皆为古今文学精品，供人们“学点文学”。(如今，情况已大大进步，中共霍邱县委党史研究室、霍邱县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为王余九整理编辑的文集《窗口》，24万字，2013年8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部分收在首篇的便是《虾圆子》)。

无论王余九在霍邱如何不得意，但皖西文人特别是写小说的人，还是识“货”的。因此，1984年六安专区成立了“文协”(当时不好意思也不敢叫“作协”)，咱们众人拥戴，众望所归，一致推举王余九为“文协”主席。但是，王余九《虾圆子》这么一噎，产生了“写点文章，总遭遇种种磨难。不写了，安定完事”《窗口·前言》的思想，创作活力大不如前，虽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不能跟《虾圆子》同日而语了。他曾同我们说过写中篇、长篇小说的计划，也再没有实现。

王余九《虾圆子》的教训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不能说“噤若寒蝉”，但再不敢随便挥洒了。2022年我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一部30余万字的《徐航小说选集》，短篇小说部分有一篇《鼠祸》。这篇小说发表于《安徽文学》1985年第五期。小说写某地爆发传染病“出血热”，这种病为黑线鼠传播。因此，捉鼠防病的猫非常稀缺。县委宣传部通科科科长余穆山，家里只有一只名猫，但他不经意之间，答应送给三个人：新、老县委书记和当地报社总编办公室主任。于是，三人应约找他要猫。余穆山无法，只得将猫勒死，分别送给三个人，三人都不要死猫，顺利解决了他的难题。余穆山是我们官场中滋生的一个阿谀奉承、圆滑世故、鬼点子多多的怪胎。他把当地三个名人玩于股掌之间，是一个恶人。这个人名曰“余穆山”，显得



底白字，好似一枚印章，为整幅画面的点睛之笔。说我“荣休”，其实难当，受之有愧。18岁中专毕业后进入教育岗位， 尽管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42年，虽然在市教育局工作25年有10个年度单位考核为“优秀”，尽管在36岁时被省政府批准为“特级教师”，成为本单位首位“特级”……但我做的还很不够，没有为单位的、为我市教育管理、学科教学研究取得更大的“光荣”。“荣休”，这是张老师个人对我的谬赞和褒奖，我深知是“退休”，而不是“荣休”

在“荣休纪念”下面、杯的正中间，刻着两行均衡排列的四个短语，金黄端正的碑体：严传身教、吾师吾友，仍怀热血、可江可海。这是张老师熬了好几天心血的结晶。这16个字是我的“漫画”，它不仅巧妙地将我的名字嵌在其中，还将我的特点特长、品质品行做了勾画与放大。“严传身教”，是的。我到市直机关早、年龄又长，多年接受领导和前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所以在管理和研究方面时刻尽可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积极主动、紧张快干、精益求精、舍得身子、不怕吃亏，进办公室卫生也常与张老师抢着干。“吾师吾友”，这里有对我的过分尊重。其实

怪怪的。其实我在写作时害怕有人对号入座，颇伤了一些脑筋，我的署名曰“徐本法”，三字半边便是“余、木、三”，谐音“余穆山”。我在当时六安县委宣传部担任新闻通讯科科长，“余穆山”影射的就是我自己，这下总该行了吧！果然，小说发表后平安无事。我想，即使有事，我也有应对之策。

纪念王余九，但愿王余九“《虾圆子》事件”不再出现。在各县、各区领导的关心下，我们的作家、诗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能乐享甘霖、如沐春风！

我们须知，培养出一位成了气候的作家，是很艰难的。据我观察，文学追逐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一，即100个文学追逐者，往往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这还可能有点多估。翻看县志市史，记载的文学作家非常稀少。像叶集，一下出了4个“末名社”成员，4个卓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这在全国万千小镇中所仅见。

我们须知，青年作家住往有点特立独行，脾气有点怪，不会说话，容易得罪人，甚至还做出一些荒唐事。这就要求我们有关领导，善于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以宽广之心包容他们，使他们茁壮成长，顺利成才。现在咱们六安各县区文学追逐者众多，非常热闹。这很好，这是基础。基础雄厚了，才多“拔尖”之才。但是，各地真正成为巨树栋梁材者，也就那么一两个、三四个，我们要是把他们视为“县宝”、“区宝”，多加关注，着意培养。

我以为，咱们六安地区培养文学人才，培养青年作家做得最好的，要数霍山县。他们40多年后就成立了小南岳文学社，霍山县委、县政府一届又一届领导，对其关注、关心，解决实际问题，不惜力气培养。如今，硕果累累，出现数位作协会员，出了几十位省作协、市作协会员，出版了近200部集体和个人原创作品。霍山县出了一位全国性的作家谢鑫，已出版100多部作品，近千万字。他有家学渊源，祖父谢邦田是霍山诗词名家，叔父谢鑫是霍山当代文学大家，谢鑫自己更是勤奋刻苦。但是，谢家三代，都离不开霍山领导的关注和培养。据说谢鑫的工作，经县委宣传部的关心安排，使他既不脱离生活，又有充分时间写作。由此，我们知道：任何成功的荣耀，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我们还是回到王余九。王余九的旧体诗词写得也极好。他的文集《窗口》就收了旧体诗词54首，我发现，有两首居然与“《虾圆子》事件”有关，不妨抄在这里：

《虾圆子》入选《安徽60年优秀小说选》有感

一篇小说世皆奇，万姓争传如醉痴。十载劫魔经九死，半生机遇总无期。庶民企望成虚幻，恶吏依然有所恃。三十年间成旧事，枯梅今又发新枝。

感 怀

廿年困顿老风尘，病笔犹矜半世情。犹国有心怀杜甫，饮醇无量愧刘伶。曾因文字恼官史，常借诗词写庶民。鬓白不堪守寂寞，一腔热血仍干云。

遗憾的是，王余九允诺我们的“枯梅新枝”，“豪气干云”的景象并没有出现。在六安市“老新协”的景下，去年我主编了一部《王京隆全集》，收文100余万字，今年可望出版；近年，我还参加了《孙颙全集》的编选，数百万字。老九呀，你的文集只有24万字啊！怪谁呢？你自己也有责任呀！咱们不能“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诚知我在《窗口·前言》中所作的检讨：“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自己意志不坚定，浪费了人生，对不起培养我的党和人民。”但是，人生没有二度，一切都无法补救了。

王余九，我的文友，愿你在天堂安宁！

珍藏心底荣休杯

严 仍 江

张老师博学多才、见多识广、文理兼工，体教双修，我们是互为老师。很多时候，是我向他请教和学习。他常常是我文稿的第一读者兼编辑老师。“仍怀热血”，大概是我临近退休时和退休后的工作与生活态度比较积极，没有懈怠和消沉之意。是的，就在组织批准退休之后一个月，我仍旧坚持完成了4项全市性大型教学活动的组织工作。目前，还在后台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宁愿自己掏腰包。“可江可海”，就我的心胸来说是可以的。在市一级层面，没有“江海”一样的长度和宽度处人待物，事业很艰难风生水起，事情很难应付裕如；如果就专业能力、水平而言，我至今还是“半瓶醋”，尚在河塘沟渠之中当“狗刨”，岂敢到江海里搏击？张老师的想法挺有诗意，他愿我的人生不但有江的长度和灵动，也有海的广度和深度。这权当是对我的期望和勉励吧。

这尊退休纪念杯十分珍贵，无论材质，还是形影、画面，都是那么和谐美好，相得益彰。她既凝聚着张老师与我同室四载的深厚情谊，也包含着他对我 的善意肯定，也寄托着他对我的美好祝福！我将把她当成一个里程碑，摆在醒目位置，珍藏心底。